

濟南文化論叢

第一輯

張華松 主編



濟南出版社

濟南文化論叢

濟南文化論叢

第一輯

张华松 主编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文化论丛. 第1辑 / 张华松主编.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488 - 0563 - 2

I. ①济…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济南市—文集
IV. ①K295.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9263 号

责任编辑 张伟卿 张慧泉

封面设计 侯文英

作 者 张华松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531 - 86131730 86116641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19 86131741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85 毫米×26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00 千

定 价 68.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 - 86131736)

法律维权:0531 - 82600329

编委会

主 任：范跃进 韩圣喜

副主任：韩 宏 马军远 张华松 王国庆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黎明 王铁军 齐 峰 刘传霞

李光红 林吉玲 姜元奎 董建霞

主 编：张华松

副主编：董建霞

卷首语

韩圣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阐释和安排部署，吹响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角。济南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加快建设富有独特魅力和创造活力的文化强市，努力把济南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增创泉城发展的新优势。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山东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她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九千年前，这个地区就已有了一人类活动的踪迹。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济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她是大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自唐代始就有“舜城”的雅号。她是“文学之国”，是享誉天下的“诗城”。济南籍诗人和文学家数不胜数，唐代的崔融、宋代的李清照、辛弃疾，元代的杜仁杰、张养浩，明代的边贡、李攀龙、李开先，清代的王士禛、田雯等皆是闻名全国、辉耀文坛的佼佼者，李白、杜甫、曾巩、苏辙、元好问、赵孟頫、王守仁、顾炎武、施闰章、阮元、刘鹗、老舍、



季羨林等都在此游历或工作过，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佳什名篇。济南还是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典范，日益兴盛的工商业奠定了山东经济中心之地位，开放多元的文化为近代济南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源远流长的历史，蔚为大观的文化，是这座城市的根基和灵魂，体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是济南文化强市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济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研究和弘扬济南历史文化，为济南建设服务，素为济南社会科学院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济南社科院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开展文化产业研究，为济南文化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力促将济南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认真落实市政府《关于济南大学服务济南行动计划》的决策部署，济南社科院与济南大学积极开展对接工作，并与济南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密切合作，联合省内外相关科研资源和力量，对济南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阐发，对济南现代文化进行总结和提升，对文化产业的开发进行深度调研和理论探索，并将研究成果每年结集出版为《济南文化论丛》，以期为济南文化建设作出切实的贡献。现编辑出版的《济南文化论丛》（第一辑）就是一部探讨和研究济南历史文化的高品位的学术论文集，所收论文涉及济南历史和文化的诸多领域，资料翔实、论述严谨、观点新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六经责我开生面”。济南社科院将搭建好《济南文化论丛》这个平台，以高度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始终不渝地坚持研究、传承、弘扬济南文化，加强济南历史文化研究，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济南文化强市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2年3月

（作者系济南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目 录

001	卷首语	韩圣喜
001	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	张华松
028	汉代济南伏生及伏氏家族述论	董正春
033	济南郡治西迁历城原因暨新历城布局蠡测	高继习
042	济南若干历史地名琐议	王铁军
050	金元时期济南全真道初探	谭景玉
060	历史悬案：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济南	辛 益
072	明代三篇济南华不注山“游记”佳话	唐景椿
080	明代大诗人李攀龙葬地考	雍 坚
086	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述评（上）	刘 瑜
104	论李清照《如梦令》写作缘由	周长风
109	李清照里籍问题二议	荣 斌
116	也谈李清照的原籍问题	李秉楹 刘怀才
121	济南广智院的历史及其社会教育事业	怀恩光
127	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略论	王 林
150	民国时期的济南扶轮社	刘本森
162	清代山东巡抚行政内容变化与周馥自行开埠	党红星
168	开埠以来济南城市广场的历史变迁	曹文明 张洪杰
181	济南近代城市街道历史演变及风格研究	姜 波
190	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山东独立问题	孙 昉 刘 平



204	辛亥革命与济南社会的变革	董建霞
218	吴化文起义始末	姜 洁
228	济南人的性格	张继平
231	浅谈省城文化发展定位	吕荣斌
236	济南城市特色的美学创造	刘毛毛
244	历史文化与济南百年老号	姚衍琛
254	济南筹办“十艺节”的总体定位与策略原则	石兆宏
263	方志的文化资源价值与济南文化软实力	林吉玲 满 霞
269	推进济南市旅游度假区科学发展的创新对策探讨	梁永贤
280	济南市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与问题研究	张桂兰
290	济南市公共文化服务对文化产业的基础保障和制度支撑	闫 平
301	繁荣发展济南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研究	李 战
316	济南市加强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及其文化建设的对策性研究	王鲁宁
331	总结借鉴党的群众工作经验 努力提高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	齐 峰
337	发挥高校优势,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张 兵



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

张华松

一、征夷方取道济水可行性分析

殷墟卜辞中有关殷末十年（祀）征夷（人）方的记录最多，也最系统，学者有将其系于帝乙的，但更多则系之于帝辛（纣），考虑到传世文献多有帝辛征东夷的记载，我们认为以帝辛的可能性最大。

十年征夷方起点大邑商为商朝后期都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这基本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卜辞所见征夷方途中第一站的雇，故址在今河南省范县顾城，也是多数学者的共识。^①至于夷方地望所在，由于对卜辞“夷”字的释读有偏差，更由于对征夷方往返途经地点的认识有分歧，致使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总体而言，夷方在今山东省境内，更确切地说在今鲁北地区，却是一种渐居主流的观点。^②鲁北说的主要依据是有关十年征夷方的几个地名在淄潍一带，如“齐”在临淄，寻即斟寻在临朐，淮即潍河，攸在益都等等。近年来，李学勤先生通过对文丁征夷方卜辞地名有澧即古文献中齐都临淄一旁的澧水，与帝辛征夷方地名有齐、淮（潍）相配合，作为“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的新证。^③言之凿凿，可成定讞。

由于征夷方往返途经的几个主要地名无确址可考，李学勤先生主要根据剡氏铜

① 雇，即顾。《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公与齐侯、邾子盟于顾。”详见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载王尹成主编：《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载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器出土于兖州、杞国铜器出土于新泰，来设定征夷方的路线：“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①迁就新泰和兖州铜器出土的地点，遂使所设定的往返路线都要翻越崎岖难行的泰沂山脉，济南地区从而被完全撇开在外了。对此，笔者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

为便于讨论，兹将十年征夷方往返的卜辞记录（前方战区除外）迳录如下。^②

惟十祀在九月，甲午，余步从侯喜征人方，告于大邑商 《卜通》 592

甲午，余从侯喜征人方 《明》 154

在（闰）九月癸亥，征人方，在雇 《林》 1.9.12，《前》 2.6.6

在十月癸酉，征人方，在勤 《哲庵》 255

乙酉，在香 《珠》 263

丁亥，在噩 《珠》 263

己丑，在乐 《珠》 263

辛卯，在霄 《珠》 263

癸巳，在霄 《珠》 263

惟十祀在十月，甲午，征人方，在霄，比东 《续》 3.29.6

乙未，在霄 《合》 12.36553

丙申，在霄 《续》 3.14.6

在十月（又一），辛丑，征人方，[步]于商 《摭续》 153

[壬]寅，在商 《珠》 263

在商，[步]于亳 《上》 9.12

在十月又一，癸卯，征人方，在商^③ 《金》 584

己酉，在百 《珠》 263

辛亥，在百 《珠》 263

在十月又一，癸丑，征人方，在亳 《金》 584

甲寅，在亳，步于鸿 《上》 9.12，《续》 3.31.7

.....

（以下为返程）

①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依据陈梦家：《正人方历程》，见《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304页。同时参考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乙辛卜辞征人方》附表一《殷末征人方往程》、附表二《殷末征人方归程》。为排印方便起见，俱厘定为通用汉字。

③ 陈梦家先生厘定为𠂔。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说：“‘商’字残，据残笔当是商字。陈梦家定为𠂔，失据。”



.....
在二月，癸巳，来征人方，在齐次 《前》 2.15.3, 2.15.5

甲午，在意，步于剡 《前》 2.8.7

在三月，[癸卯]，来征人方，在雷 《缀》 189

乙巳，来征人方，在□，田商 《续》 3.28.5

丙午，在商，步于乐 《续》 3.28.5

己酉，在乐，步于噩 《续》 3.28.5, 《金》 583

庚戌，在噩，步于香 《续》 3.28.5, 《金》 583

辛亥，在香，步于离 《合》 36501 + 36752

癸丑，在离 《英》 2525

甲寅，在离，步于□ 《英》 2565

四月丁卯，今日步于雇 《合》 36539

(在四月)，癸酉，来征人方，在云萸河邑 《金》 728

在五月，癸卯，来征人方，在喜次 《续》 3.18.4

在五月，癸丑，在喜次 《续》 3.18.4

比较以上往返行程，不难发现：第一，地名基本相同，证明往返大致取道同一路线。第二，往返都是一路前行，很少出现在前方战区那样迂回反复的现象。第三，往程从雇地开始，除了十一月辛丑“[步]于商”，[壬]寅“在商，[步]于亳”，卜辞不曾出现“步”字；而从十一月甲寅“在亳，步于鸿”开始，卜辞记事皆为“在甲地，步于乙地”，很少例外。根据十年征夷方卜辞记录的这一特点，似乎可以推论往程主要取道水路，归程主要取道旱路；鉴于往返所经地名又大多相同，则归程取道旱路时，也与往程取道的水路相去不远。

以此推论为前提，倘若再考虑到征夷方卜辞所见第一站为今河南省范县东五十里的顾城，而所征夷方又在今山东省鲁北淄潍之间，那么就可以初步认定十年征夷方取道的水路很有可能是济水。

商王取道济水东征夷方，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其一，从古济水河道的走向来看，济水是东征夷方最理想之通道。

关于古济水河道的走向，依据《禹贡》、《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以及清人胡渭《禹贡锥指》的研究，其在山东境内的故道可以济南历城为界，历城以上至东阿，大致就是今日的黄河河道，东阿以上则向南逐渐偏离黄河，其故道大致在今东平、梁山、巨野、定陶一线。历城以下的济水故道，基本就是今日的小清河河道。小清河经历城、章丘、邹平、高青、桓台、博兴、广饶诸县市区，最后在寿光与广饶交界处注入渤海莱州湾。商代济水下游河道与小清河河道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走向和位置总不至于相去太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今历城、章丘境内古今水系变化较大。据《水经注·济水》，泺水、历水合流于济南城北，“又北，听水出焉”。又，巨合水（今巨野河）“又北，听水注之。水上承泺水。东流北屈，又东北流，注于巨合水，乱流又北，入于济”。济南北郊鹊华一带地势低洼，济、泺、听诸水相汇而为方圆数十里的鹊山湖，自鹊山湖以东古听水一线，“水弥漫数十里”。^①此虽为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情形，想必殷商时代也应如此。总之，听水虽与济水分处华不注山南北，却头尾相通，实可视为济水的支津与支流。小清河源头一段所走即是听水故道，至于章丘境内小清河故道，据金元明时期文献，应是自今历城东北隅的老僧口一直向东偏北穿过白云湖、涓口、薛渡口、柳塘口而进入邹平地界。这一段的小清河故道便是济水故道。白云湖，据元好问《济南行记》，金元时“周围四十里”，东岸距绣惠镇女郎山仅数里之遥。济水出湖东北行，至涓口，有百脉水（近古以降，称涓河和绣江）来注。

济水作为“四渎”之一，是一条伟大的河流，她的河道平直深阔，水清流缓，是沟通中原与渤海沿岸（尤其西南岸）地区的当之无愧的黄金水道。为此，早在七十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就曾说过：“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②试想，殷商王朝对渤海西南岸的淄潍地区的夷方用兵，不可能不充分借助济水的交通运输之便。

其二，从商代的水上交通能力来看，通过济水通道远征夷方也是可行的。

宏观考察古代交通发展史，水上之舟楫交通远比陆上之车舆交通起源要早，也发达得多。殷商时代路况很差，交通主要依靠徒步和牛车。相比之下，水上交通因其运量大，捷便省力，故而在河网交错、湖泊众多的中东部平原地区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通过殷墟卜辞可知，商朝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甲骨文𣎵字像群舟泛于中流，大概就是内河上的军事船队。武丁以后多有“王率舟”的卜辞记录，证明商王率领船队顺水而行也是颇为常见的事情。^③总之，从殷商后期内河交通的发展水平上看，征夷方取道济水是完全可行的，而事实上卜辞确有舟行济水用兵于东夷的反映。如：“方其𣎵于东。”（《合集》20619）按，殷商的“东”是一个特定的重要地理概念，所指主要在今鲁北地区（详下），舟行于东，很有可能是取道济水。又如：“惟𣎵用𣎵于之若，𣎵方，不雉众。”（《合集》27996）𣎵为人名，𣎵为“流”的初字，𣎵的释义同“捷”，𣎵方即莒方，东夷嬴姓古国，春秋中叶以前都介根（今山东胶州城南三里河村附近）。𣎵率商军顺流而下，进攻莒夷，无疑也是先取道济水、后转从陆路东进的。不特此也，殷墟三期卜辞更有一版明确提

① 《太平寰宇记》卷十九《述征记》。

②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③ 详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2页。



到征莒方取道济水：“惠又……𡩺，戕𡩺方……戍。”（《屯》3637）𡩺隶作𡩺，即古涉字，也就是济水之济。^①卜辞大意是贞问是否可以取道济水打败莒方。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济水的流向来看，还是从济水的运输能力来看，十年远征淄潍一带的夷方，按道理说都应该是取道济水的。

二、乐、商及二“亳”等几个重要地名的考察

（一）乐在今济南泺口考

根据十年征夷方卜辞记录，十月己丑，商王抵乐，自雇至乐共用时26天。那么，乐在何处呢？

王恩田先生在《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一文中，^②根据剡器出土于兖州，杞器出土于新泰，攸（攸）器出土于滕县后黄庄，𣪠（永）器出土于滕县金庄，商丘叔簋出土于泰安之道朗，考求十年征夷方路线，往程为：大邑商（今河南安阳）——扈（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顾城）——乐（济南趵突泉）——商（今泰安道朗）——亳（山东曹县）^③——攸（滕县后黄庄）——淮（今淮河）；返程为：淮（今淮河）——攸（滕县后黄庄）——杞（今新泰）——剡（今兖州）——商（今泰安道朗）——乐（济南趵突泉）——河（古黄河）。在此，他显然是把十年所征夷方安排在今鲁南地区，而林方犹在淮水下游了。

王恩田先生的甲骨文“乐”为济南说，^④建立在一条路线和三个支撑点上。一条路线即帝辛十年征夷方路线。这条路线是根据国族铜器定点法所确定的五个地点以及参考文献记载所考证的其他若干地点确定下来的。他认为这就为“乐”在济南说确定了大方向。三个支撑点均在泰安境内，即商在道朗龙门口水库一带；蒿（亳）在蒿里山，鸿在洪沟一带。

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条路线和三个支撑点颇难成立，诚如论者所言，新泰杞器群属于春秋早期，“与商代毕竟有七八百年之隔，不能排除杞人后迁的可能。倒是

① 见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 载王尹成主编：《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按2003年王恩田先生撰写《济南建城史刍议》一文，就征夷方的“亳”地所在，修正了其以往的观点，说：“李学勤先生力排众议，提出甲骨文中的亳字应是从草从高省的蒿字的误释。我吸收了这一研究成果，把征夷方路线中原定在曹县的亳改释为蒿，考订在泰安近郊的蒿里山。同时把原来未能考定的𡩺即鸿改释为春秋时鲁‘大蒐于红’的红，其地应在泰安城南的洪沟一带。”文载徐北文、李永祥主编：《济南文史论丛初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关于征夷方的“乐”即济南趵突泉，王恩田先生又著文予以申说，详见《甲骨文中的济南和趵突泉》，载《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济南建城史刍议》，载《济南文史论丛初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

胶州西庵遗址出土的属于晚商或周初的杞器，与商末征夷方有更多的联系。……此地（胶州西庵）更可能是杞人在商王朝东征的重压下向东退守的一支。再联系到其与亚醜的密切关系，商代杞地所在当不出鲁北地区”；“兖州是否就是商代的索地所在，也不能确定。因为这组器物的年代并不能肯定为商代，完全有可能属于周初，所以原报告作者推测，兖州的‘索氏族当是随伯禽东来时被安置在这一带的殷民六族之一’。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①至于以商丘叔簠出土于泰安道朗，证明道朗为商丘即商，“亦非。按商丘叔簠器盖对铭，已著录于《邃斋集古录》15.7，出土地点不明，泰安所出商丘叔簠与之同为同器。盖清祚颠覆后，流散至泰安者也。纵即确知商丘叔簠出于何处，亦不得遽定彼处为商丘。……商丘叔固以邑为氏，有此氏名者，不必皆在商丘。故仅止一商丘叔簠远不足以考定泰安即商丘”。^②

平心而论，论者的质疑不无道理。另外诚如王先生所言，商王所征之夷方和林方分别在鲁南和淮北，那么往返就完全没有绕道乐（济南）之必要，且看王先生文中所绘《十祀征人方路线图》，往返路线东绕西折，倘若是在敌占区迂回前进还能说得过去，在殷商控制区也如此就令人颇是费解了。

要之，王先生所设定的十年征夷方路线存在问题，立论的几个支撑点也比较脆弱，故其首倡的“乐”在济南说就有些不足以取信于人。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王先生的“乐”在济南说确是一个卓识，是很值得重视的，虽然在笔者看来“乐”更有可能在乐口（泺口），而非乐源（趵突泉）。

笔者之所以认为“乐”在乐口（泺口）而非乐源（趵突泉），是因为：

第一，卜辞有“……以多……泺”的残辞（《前》4.13.7），泺字从川乐声。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认为此字就是许慎《说文》中从水乐声的泺。《说文》原文曰：“泺，齐鲁间水也，从水乐声。《春秋传》曰：‘公会齐侯于泺’。”泺水在济南，古今无异辞，但是泺在卜辞中仅此一见，因属残辞，用义不明。然而“依卜辞通例，水名每增‘水’用为专字，卜辞‘乐’为地名，地名与水名每相因”，^③则卜辞“泺”为水名当无疑义。“泺”之残辞属于武丁时期，而“乐”作为地名又始见于武乙、文丁时期卜辞“……未贞：……在乐”（《合集》33153），据此似乎泺水之得名先于乐邑。

第二，《山海经·东山经》云：“又南三百里，曰岳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泺水出焉，东流注于泽，其中多金玉。”岳，郭璞注音“乐”。《山海经》成书晚自

① 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载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蓝野：《商周夏杞夷杞考》，载王尹成主编：《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③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00页。



战国，资料来源却比较古远，有关泺水的这段文字也是弥足珍贵的。另外，从《山海经》于岳山、泺水之后介绍泰山、环水、汶水以及泰山物产的文字看，其有关泺水的记载也应属于实录性质。根据这条实录，商周以前的泺水发源于岳山脚下，向东注入湖泽。从方位上考察，泺水所出的岳山应该就是今日济南西北郊区的药山。其实不论岳山，还是药山，本名都应写作“乐山”，因为“药”、“岳”、“乐”古音相同；至于何以命名乐山，大概是取山上“多桑”，桑条上蚕丝缠绕之意。^① 山为“乐”，水因山而名，故称“泺水”；泺水注入的湖泽，大概就是后世的鹊山湖。泺水出了湖泽，向北注入济水。从上述地理方位形势考察，乐邑必在泺水入济处的今济南北郊泺口一带。

第三，商周时代的泺水既然发源于湖泽西南的岳山（药山），那么发源于今济南老城区内外诸泉并向北注入湖泽的河流可能统名之曰历水。据酈道元《水经注》，历水发源于今济南老城舜井街一带“泉源竞发”的舜泉泉群，北流而折趋西北，与发源于泺源（今趵突泉）的泺水相会于历水陂（故址在今大明湖西部）。按照酈氏的记述，历水似乎只是泺水的一条支流。事实上如前所述，商周泺水的正源在岳山，那么《水经注》中历水陂以上的泺水很可能原是历水的一条支流。

据周厉王时的禹鼎铭文，^② 噩侯御方“广伐东国”，兵抵“历内”。“历内”也就是“历汭”，历水曲隈之地，也就是《水经注》历、泺二水之间的历城古城，即今济南老城的西半部。又据与禹鼎同时的师寰鼎铭文记载，淮夷曾侵扰“东国”，周王令师寰率齐师以及纪、莱、莒三国诸侯前往抵御。莒即历。齐、纪、莱俱在鲁北，历与其地相近，则必为济南之历。又，史密簋为周懿王时器，比上揭二鼎时代还要早一些，其器铭记述说，南夷、莒、虎、会、杞夷、舟夷等广伐东国，周王命师俗率领齐师为左路军，命史密率领族人以及莱、白、莒三国诸侯武装为右路军，分道合击长必。此役，参与双方阵营的各邦国都在今山东半岛，莒即历，也必为济南之历。

由以上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代的历汭有一个历国，且很有可能属于殷商旧国。济南老城高都司巷和旧军门巷一带都曾出土有殷商文化遗存，^③ 济南老城西侧的刘家庄还曾先后出土过 15 件晚商铜器，^④ 其中二号觚圈足内壁上铸有铭文“父辛”二

① 按甲骨文乐字作𠂔，王献唐《说捩线》说：“余意乐为缠挂丝绵之木叉，从丝木会意。丝之下端，且皆合连木上，形义尤显。古音乐隶宵部，读若约若劳，与绕缘声同，以丝绵绕缘叉上得名，犹今语缠子。”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3198 页。

② 禹鼎以及下面提到的师寰鼎、史密簋铭文全文及考释，俱见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见崔大庸、许延廷主编：《济南重大考古发掘纪实》，黄河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9、285 页。

④ 李晓峰、杨冬梅：《济南刘家庄商代青铜器》，《东南文化》2001 年 3 期。

字。另外，至少一鼎、一簋、一卣上还铸有“𪛗”字的族徽。这一切都证明济南老城尤其老城西区可能就是刘家庄“𪛗”族墓主人的邦邑所在，也就是说在商代这里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个历国或历邑。如此，殷商时代的济南老城区若有城邑，邑名只能是“历”，而不可能是“乐”。

（二）“商”在今章丘回村考

十年征夷方途经的乐，在济南城北济水南岸的泺口，是可以确定的。至于乐之后如“商”、“亳”等几个关键性的地名，学者们在定位上也都出现了严重偏差，如董作宾、陈梦家等先生认为商即河南商丘，亳在商丘南谷熟集一带；^①王恩田先生认为商在泰安道朗，亳在曹县境内，后又认为亳在泰安蒿里山；^②郑杰祥先生认为征夷方的商在河南淇县朝歌。^③总之，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王震中先生否定了现有的十年征夷方“商”、“亳”地望的各种成说，却又没有提出新解，于是干脆将有关“商”、“亳”地名的卜辞统统从十年征夷方谱中抽去，“把它视为十五祀（年）征人方卜辞或其他时间的卜辞”，并认为商即大邑商，也就是商都安阳，与商比邻的“亳”就是河南内黄的亳邑。在他看来，只有如此，学术界七八十年来征夷方“商”、“亳”地望研究的治丝益棼的混乱局面就会结束，“上述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④在十年征夷方“商”、“亳”地名的确定上，目前已有的各种观点确实都存在问题，但是将相关卜辞从十年征夷方谱中撤下，终究不是办法。

那么，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问题是否有更加合理的新解呢？答案是肯定的。现在且就征夷方途中所经最为重要的地名“商”予以考证。

《汉书·王子侯表上》记载，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安为杨丘侯。景帝四年国除为县，属济南郡。《汉书·地理志上》：济南郡辖县十四，第七为阳丘。阳丘即杨丘。东汉以降，虽然不设阳丘县，但是阳丘故城仍然存在数个世纪之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云：

右纳百脉水，水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其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世谓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谓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迳黄巾固，盖贼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脉水又东北流，

① 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大陆杂志》第6卷第1期；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6页。

② 出处见前。

③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58页。

④ 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注于济。

按：百脉水在今章丘东部，宋金以降称涓河，或称绣江。百脉水北流，转而向西北穿过女郎山北麓的阳丘故城，然后经黄巾固东侧而向北注入济水。黄巾固即今章丘水寨城子庄（本名古城），隋唐宋金时期，一直是章丘县治的所在地。^①从《水经注》所述方位和形势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阳丘城故址无疑就在今日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北麓的回村，而事实上据笔者实地采访得知，在回村村东的绣江河西岸，确曾出土过汉代砖瓦遗物，证明这里有汉代文化遗存。

《汉书》阳丘或作“杨丘”，证明阳丘并无固定的写法。如果深入研究，还会发现阳丘其实乃“章丘”之音讹。证据如下：

第一，阳与章，二字音近，则章丘讹为阳丘实有可能。

第二，上引《水经注》，北魏时的阳丘城，“世谓之章丘城”，尽管酈氏不认可民间的说法，但是世人直呼阳丘为章丘，显然事出有因，不宜轻易否定。

第三，《水经注·济水》：“济水又东，有杨绪沟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西北经土鼓城东，又西北经章丘城东，又北经宁戚城西，而北流，注于济水也。”按杨绪沟水即今章丘东境之獭河，西距绣江仅数里之遥，而宁戚城故址在今章丘刁镇东南王官村南。从方位道里上看，其所谓章丘城正是阳丘城。

第四，《魏书·地形志中》齐州济南郡领县六，第三为平陵（东平陵），平陵“有章丘城、洛盘城、平陵城、女郎山祠”。北魏不曾设置章丘县，作为平陵县属邑的章丘城显然就是阳丘城。

第五，《太平寰宇记》卷十九“章丘县”引《齐记》：“县有乐盘城，即平陵王与章丘侯钱送处，因名。”《齐记》所记乃西汉轹事，平陵王实指济南王，而章丘侯显然是指阳丘侯。

第六，《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阳丘城，在县东南十里。按前汉《地理志》齐有阳丘县，文帝封齐悼惠王子安为阳丘侯，今城南有阳丘，故以名。”阳丘城南的阳丘，即女郎山，也称“章丘”。作为山名，阳丘与章丘实为一山，作为城名，阳丘与章丘实属一城。

以上六个方面的举证足以证明阳丘原是章丘的音讹，易言之，《史记》、《汉书》中的阳丘（或杨丘）原本是应写作“章丘”的。

阳丘实即章丘，故址在今回村（旧时称回军）。章丘，按照传统的说法，其得名缘于章丘山（女郎山）。《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女郎山”条下引《齐记》：“章侯有三女溺死，葬于此。”又《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一“女郎山”下引《三齐

^① 详见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元人于钦《齐乘》卷一。然而明清《章丘县志》以及近代以来各种地方文献都认为自隋代以后，章丘县城一直在女郎山南麓的绣惠镇。这一说法可能是错误的。